

走西口：民族交融的雄浑乐章

□ 胡珊辰

自明代嘉靖年间起，中原地区尤其是山陕地区百姓为谋生，经杀虎口出关，向西北迁移至内蒙古、新疆地区，形成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称为“走西口”。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运动之一，“走西口”持续时间长、迁移范围广；尤其是对于推进我国北方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其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意义，成为一部跨越400余年民族大融合的厚重史诗。

（一）

中国传统汉文化中有“安土重迁”的观念，山陕地区更是汉文明的摇篮和重要阵地。然而，1000多年来，在多民族接壤的广大北方地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对土地与资源的争夺由来已久，边境百姓也时常因此受到侵扰，成为“走西口”出关谋生的最初人群。

此外，晋北、陕北、雁北等黄土高原地带土地贫瘠、植被鲜少、自然灾害频繁，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矛盾突出。自明朝中后期开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特别是在灾荒之年，“年头歉一歉，地主圈一圈”，许多农民失去安身立命的土地。土地兼并带来的国家税收锐减又促使朝廷开展增加田赋、增设各种苛捐杂税等一系列税收改革，更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在此背景下，大批山陕百姓纷纷越过长城，寻找养家糊口的“生命绿洲”。

汉人的日益增长和清政府与口外蒙古关系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口外地区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康、雍、乾三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也使得一些距离中原较近的口外城市成为供应军事粮草的后勤基地。新的经济市场的形成又吸引了许多商旅踏上“走西口”的步伐，进一步延长了“走西口”的时间和空间，扩大了其规模。

（二）

元朝时，留居长城以北，受中原文化熏陶较小的蒙古贵族集中地区仍保持传统的游牧经济和政治制度。长达三四百年漫长的“走西口”移民，主要是山陕地区失地农民和前往追寻财富的商旅。这些移民改变了口外蒙古部落游牧制度的经济发展方式。

明朝初年，蒙古封建主之间以及与明军之间连年战争造成农田荒芜、城郭废弃，牧民时常陷于“暴无金，

衣无帛”的困窘境地。移民从中原带去先进农耕技术和房屋建造技术，改变了这些地区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和衣食水平，也带动越来越多蒙古族人像汉族人一样兴农兴耕，逐渐定居下来，形成村落、集镇甚至城市。至清代甚至民国时期，政府或因丰富军备之需，或因领土开发需要，在蒙古地区“募民垦田”或者实行“放垦”。清政府在西北各地方设立官制，修建驿道，大兴屯田，更是官方推动“西北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极大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中原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

与维吾尔传统灌溉农业技术的交流。“走西口”的商旅队伍更促进了西北地区市场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从明初依托“开中法”进入北方边镇市场到“茶马互市”贸易，这些“边商”对巨额利益的渴望与口外蒙古人对中原生活物资和手工业产品的渴求形成完美互补，通过通贡、互市、民市甚至走私等多样化方式互通有无，通过商品交流促进口外经济繁荣，同时增进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和文化交流。清朝时期，塞外蒙古作为清政府的重要盟友，建立了以盟旗制为基础的较为完善的地方管理体制，并通过路引票照制度鼓励以山西商民为主的内地商民出关经商；西北屯田制度带来的人口聚集和农业手工业发展也为新疆地区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清政府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科布多等地设立贸易站，以境内的绸缎布匹、茶叶、药材换取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大批牛、马、羊，逐渐形成乌鲁木齐、巴里坤等新疆地区一批新兴工商业城市；天山南路各城不仅成为内地商贾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商品交易的中心，甚至成为中亚各国商人贸易的国际市场。

（三）

最初来到口外的人主要是生活困难的单身汉，他们春至秋归，往返于内地和口外之间，被称为“雁行者”。随着这些移民财富的不断积累，口外形成的小规模汉人聚落吸引了内地无地或少地的贫苦流民前往，或投靠亲友，或另辟新村，在“落地生根”后开展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家园建设行动。此外，在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下，不同职业的分布往往也带有明显的地缘特点，由共同行业或职业形成的汉人移民聚居村落，尤其是以商业和手工业为特色的村落和城镇，也快

速发展起来。

移民村落最初以独立分布为主，随着移民规模增大，蒙古族人家和汉族人家交错居住的融合式村落日益增多。与中原地区出现的很多“一村一姓”的村落不同，口外移民村落中有来自不同祖籍的居民，甚至包括一起“走西口”或者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结拜而成的虚拟亲属关系。不同祖籍文化、不同民族交融杂居带来的内部秩序结构的复杂性和风俗信仰的多元性，又进一步塑造了这些移民村落或城镇的独特风土文化。

譬如，今天内蒙古许多民居建筑在接受中原地区先进建筑技术、复刻山陕民居特点的同时，保留了蒙古族所喜爱的色彩、图案、装饰构建等。婚丧嫁娶及春节、清明和中秋等传统节庆的礼仪和民俗，也融汇了汉族和蒙古族或所在地其他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民间信仰也呈现多元混融特征，移民信仰传播到口外之后逐步融入蒙汉民众的日常生活，日积月累完成了地方化过程；传统民间信仰中的娱神活动也与塞外自然环境和风土民情相结合。文化艺术方面，漫瀚调等典型的走西口移民艺术表现形式，更是蒙汉交汇区民族认同多重表达的鲜明体现。

（四）

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以长城为界，分而治之，是中国古代自先秦时起便形成的基本格局。游牧政权与关内封建王朝之间为争夺土地和资源，或者因信仰冲突产生的对抗甚至战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的往来、文化的交流，口外各族人民与口内汉族人民逐渐加深了解，互惠互利，关系也由紧张、对抗逐渐趋于和平、相融。

“走西口”移民运动最初源于边境失地流民的无奈之举，后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中原人追求财富和新生活的一种主动选择。这一转变既伴随着中原封建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和解的过程，更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和解的历史进程，为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方面，从最初为生计所迫单枪匹马出关冒险，到为追逐财富而主动前往的“雁行者”，再到越来越多或举家迁往或落地生根的大家族，移民时间的延续性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明清时期中原封建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紧张关系的缓和，以及由此带来

的从禁止和严格限制互通到鼓励和引导交往交流的政策改变，有着密切关系。明初对西北各民族主要实行军事征伐和招降政策相结合，在西北长城沿线险要地带设立延绥、宁夏、甘肃、固原4个军事重镇，屯驻大量军队，经贸往来方面则推行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金牌制”，对边境茶马贸易加以严格限制。清政府初期严禁内地农民进入蒙古草原私自开垦耕种，经顺治、康熙两朝统治，加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推行加剧了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封禁令实际已逐渐废弛，并逐步转向“借地养民”。清末，面对战争赔款等财政压力，为加强边防势力，清政府不得不实行全面放垦。正是西北地广人稀的格局、日趋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逐步宽松的边境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移民前往口外寻找开疆拓土的新机会，成为“走西口”移民运动持续数百年，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也为移民将中原先进文化技术和思想理念传播至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另一方面，移民规模的迅速扩大和胡汉交融的移民村落和城镇的形成，又反过来推动了中原封建政权正视不可逆转的民族交融趋势，从而进一步调整和放松相关管理措施，以政策更新推进中华民族大交融。“走西口”移民运动是由困苦流民的谋生“闯关”开始的，主要是民间自发的人口迁移运动，这些寄居口外的移民是中原传统文化和先进技术的传播使者。正是他们的媒介作用，给口外的蒙古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深入和真切了解和体会中原汉文化、享受先进生产技术和生活产品提供了机会；正是他们与当地各民族的杂居融合，使这些地区的风土民情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并促使各民族文化平等、相互交融、友好共处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成为构筑民族间相互认同，从而形成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走西口”民众数量的不断增多和规模的不断增大，以及在此过程中自发形成并逐步铸就的内化于心的各民族交融和认同，不仅自下而上推动了中央政府重新认识和界定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作出一系列政策调整；还为这些政策在民族和边疆地区落地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保障。正是这一发自民间、跨越几个世纪的移民运动，重塑了我国北方的民族关系和社会格局，使不同民族结束分而治之，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大融合。

（上接1版）

以改强管，军事管理方式方法实现历史性转型。这次改革，把握和运用军队越是信息化管理越要科学化、军事越是专业化管理越要精细化的规律，坚持着眼推动我军高效能运行、高质量发展运筹谋划，有力推进了以效能为核心的军事管理革命，我军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强化依法管理。组建新的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强化依法治军，有效增强了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做好军事法规制度立改废释工作，中国特色军事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强力推动治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形成了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深入开展正风肃纪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强化战略管理。构建完善“需求—规划—预算—执行—评估”的战略管理链路，使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成为我军建设的刚性约束。军委机关真正成为军委的参谋机关、执行机关、服务机关，使指挥、建设、管理、监督等路径更加清晰，决策、规划、执行、评估等职能配置更加合理，强化了军委的战略管理功能，促进了军委机关履行战略谋划和宏观管理职能。强化精准管理。把过程控制摆在战略位置来抓，改进决策方式和程序，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完善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加强专业化评估，加强督导的针对性和刚性约束，推进精准谋划、精准规划、精准部署、精准落实、精准检验，提高了国防和军队发展精准度。

以改树人，新型军事人才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这次改革，着力重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实现我军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转变，有力推动了人才强军战略深入实施，有力促进了我军人才活力释放和效能发挥，新型军事人才建设实现新跨越。党管人才全面加强。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确立军队好干部标准，成立中央军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全方位考察识别、大范围交流使用干部，选人用人上的不良风气和政治隐患得到根本纠治。为战育人质效显著。构建以联合作战院校为核心、以兵种专业院校为基础的院校格局，扎实做好军事斗争人才准备，一批优秀指挥员快速成长，涌现出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战斗模范。人才布局整

体优化。重塑我军院校、科研机构、训练机构和军事职业教育，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重点抓好“四类人才”建设，人才工作面向未来一体推进的良好态势逐步形成。重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出台现役军官相关条例及配套法规，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取得实质进展。出台军士、义务兵、文职人员相关条例及配套法规，全面提升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颁布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退役军人保障、功勋荣誉表彰等政策法规，有力增强了官兵使命感、获得感、荣誉感。

以改赋能，全军备战打仗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这次改革，使改革设计精准对接实战需求，推动我军加快向质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转变，战斗力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威慑和实战能力大幅提升。创新引擎全速发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技+赋能”，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到军事应用的创新链路。成立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组建形成以军事科学院为龙头、军兵种研究院为骨干、院校和部队科研力量为辅助的军事科研力量“航母编队”，全面重塑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机械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一些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取得突破，开创了科技强军崭新局面。力量体系全面重构。裁减现役员额30万，重点精简机关和非战斗单位人员，既从体制编制上为发展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又以调整结构带动压减规模，从根本上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的周期性循环。推动军兵种建设战略转型，加快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着力打造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改变了陆战型、国土防御型的力量结构和兵力布势。实战能力大幅提升。全军大力纠治“和平积弊”，深化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练兵备战成效显著。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震慑“台独”分裂行径，遂行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抗击疫情、维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军事合作等重大任务，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巩固发展了于我有利的战略态势，提振了国威军威。改革强军既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又为未战先胜、打赢未来战争预置了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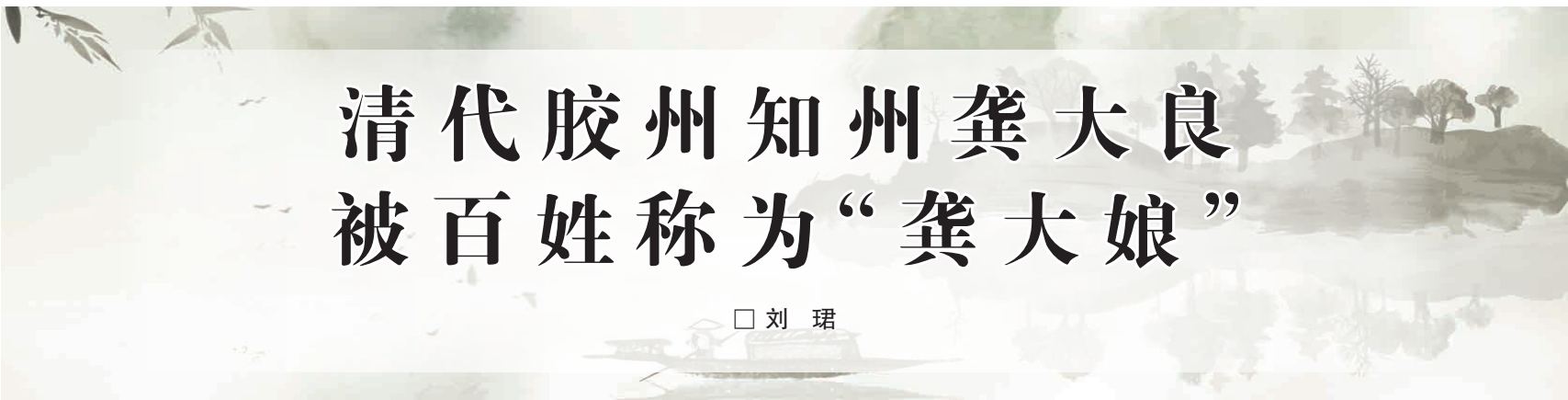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有句古话：“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另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说的是为官者必须为老百姓办事，不然就枉吃俸禄，不如回家做点小买卖。据《增修胶志》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浙江仁和县（今杭州）人龚大良调任胶州知州，在任九年间，他以爱民亲民著称，深受当地百姓爱戴，胶州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龚大娘”。

力挽危局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胶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地方史称为“甲申大疫”。有蝗虫自北向南成群结队地飞来，所到之处，庄稼、草木尽毁，饥荒严重。许多老百姓无衣无食，甚至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祸不单行，瘟疫随之肆虐横行起来，许多百姓染上了瘟疫。一旦一人染上，往往全家传染而亡，许多村落空无一人，成为废墟。一些染病的尸体被投入海里，海潮回落时海滩上可见森森白骨……十里八乡到处都是逃荒要饭的灾民。龚大良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到胶州任职的。为了迅速安定民心，恢复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龚大良临危不乱，上任



□ 刘 珺

伊始便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赈灾抗疫首要是解决物资问题。龚大良迅速命人核实胶州的财政收支状况，摸清缺口数额，以最快的速度向上级申请赈济。同时，立即派人到另外地方借粮借钱，以解燃眉之急。在稳定了民心之后，龚大良深知，仅靠上级拨款有限的救济款和借来的钱粮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要想长治久安，还得从根本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龚大良便号召胶州百姓开展生产自救，鼓励家家户户种菜种粮以抵抗灾荒，为后来的生产生活打下了基础。为稳定市场、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龚大良下令以最严厉的手段制裁奸商、平抑物价，稳定民心。

针对灾荒之后社会治安混乱、盗匪横行的状况，龚大良下令严格执行保甲制度，每一保由1000户组成，其中每10家立一牌长，每10牌立一甲长，每10甲即1000户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张印牌，上面写明本户丁口、从业状

况，户内有人外出或者有客来访都要注明行踪，牌头、甲长等平日对这些情况进行稽查，如有可疑之人立即上报保长、地方官处理。保甲制度有效改善了盗匪横行的社会治安状况。为安抚民心，龚大良还清理了过去的一些冤假错案，使部分受到冤屈的百姓重获新生。一系列的措施实施下来，不到半年的时间，胶州百姓生活开始改善，治安开始恢复，民心开始稳定，局势有所缓和。龚大良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稳住了胶州局势，获得胶州百姓的认可。

治兵固防

胶州地处山东半岛胶州湾畔，沿海百姓以渔猎为生。一些专抢渔船的海贼沉渣一气，逐渐猖獗起来。他们经常抢夺渔船和财物，使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龚大良决定彻底整治海贼扰民的问题，还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为了加强对匪患的防御，龚大良一方面召集民工修筑防御工事，另一方面他新招募兵丁1000多人充实力量。龚大良厉兵秣马，对兵丁进行严格密集的训练，给他们配备上精良的武器，使之很快成为行动迅速、战斗力强的武装力量。康熙四十八年（1709），一伙海贼来到灵山卫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龚大良在得知消息后，立即亲自带领兵丁，率轻骑向南飞驰“百六十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灵山卫。发现了贼寇的船只后，龚大良率士兵悄悄潜入贼船，海贼头目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拿下。其他海贼见头目被擒，纷纷逃窜。龚大良乘胜追击，一举抓获海贼58人。经此一战，流窜在胶州地方的海贼受到了很大的震慑，不敢肆意猖狂，老百姓也较少受海贼侵扰，日子逐渐安定下来。为了进一步巩固胶州城的安全，在龚大良主张之下，于

康熙五十一年（1712）修缮胶州城池。由此，胶州城的安防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育民利民

龚大良非常关心群众疾苦，他任职期间经常微服私访。他发现老百姓由于灾荒致贫，生活无以为继，以至于不少百姓卖儿鬻女、押地租房。龚大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每当他得知有这种事情发生，便亲临抚慰，直接找到买主本人劝说，动员他们从宽或者直接解除契约。许多人看在龚大良的面子上，大多宽容地对待卖儿鬻女的家庭，更有一些大方的事主直接解除了契约，使这些孩子重获自由。据《增修胶志》记载，龚大良在胶州任职期间“劝赎难民万口”。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如同娘亲，直呼他是亲民爱民的“龚大娘”。

访查期间，龚大良还发现一些家

境贫苦的老百姓很难接受到教育，致使许多正值少年的孩子目不识丁。为了让更多可能的孩子学习到知识，康熙四十六年（1707），龚大良筹集资金，在学宫以西位置，兴建义学三间，又在北乡马店建社学三间。康熙四十八年（1709），龚大良又重修胶州儒学。设置了这些学堂，给学子提供了学习的场所和获取知识的途径，为当时胶州的文化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胶州河多，云溪河、墨水河、护城河、大沽河、胶莱河等数条河流，或贯穿城中，或在州边蜿蜒。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出行难题，龚大良在州治东25里处重修显灵桥，在州治东南30里处重修石漷桥。康熙五十年（1711），他又发动乡绅富贾捐款，在州治东40里处兴建利济桥。桥梁的修建，极大方便了胶州老百姓的出行和生产生活。

康熙五十二年（1713），龚大良以政绩卓著升为刑部郎中。龚大良在胶州九年，勤政爱民、福泽百姓，他的政绩也得到了老百姓的充分认可。在他离任之时，胶州各界自发筹集资金为他立碑勒石，建立生祠、竖立肖像，以铭记他的功绩。根据《增修胶志》记载，龚公祠有三处：一处位于胶州城隍庙大殿西侧，由部分胶州绅士乡民集资筹建，祠中碑文字里行间显示出对龚大良的肯定与感激之情；第二处为胶营兵目公建“龚使君生祠堂”，位于旧文庙处，其碑文以华丽的辞藻和文风，对龚大良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第三处位于旧小桥北路西处，由南商邵启升、金元顺、韩元大等“公建郡伯龚太尊生祠”。